

论《儒林外史》在叙事时空上的巧妙构建

桑甜甜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摘要】《儒林外史》通篇充斥着真与假、穷与达、显与隐、雅与俗以及巧与拙等形形色色的儒林人物,同时小说在社会生活画卷的铺展上,从国家上层政治文化制度一直到底层百姓生活现状,也是无所不包。如此精彩纷呈的人物出场和丰富深刻的社会生活画卷展现,充分显示出吴敬梓在构建小说叙事时空上的巧妙艺术手法。正是这种叙事时空的巧妙构建,也使得小说在复杂繁琐的叙事过程中得以自由吞吐、容纳万象。

【关键词】《儒林外史》;叙事时间;叙事空间;构建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2)01-0028-03

作为一部反映出明朝儒林现实的长篇小说巨著,《儒林外史》诸多儒林人物的纷繁出场和社会生活画卷全景式展现,仅以跨度短小的叙事时间去演绎推进显然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凭一个幅度狭小的叙事空间去结构完结整部作品同样是不可靠的。本文将从文本的叙事时间与空间这两个层面进行挖掘与探讨,进而深入阐释《儒林外史》在叙事时间上的演绎推进和叙事空间上的结构完结,以此充分把握小说独特的叙事时空构建艺术。

一 《儒林外史》在叙事时间上的演绎推进

作为一种必要的叙事谋略,叙事时间在文本叙事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对《儒林外史》而言,由于其本身缺乏贯穿始终的核心情节与核心人物,因此它对于叙事时间的把握也就自然而然成为演绎和推进作品人事、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吴敬梓正是通过运用这种叙事手段,最终联结成《儒林外史》。

从整体上来看,《儒林外史》的叙事时间跨度长达百年之久,生动地呈现出一幅百年儒林的历史画卷。《儒林外史》决不是一部普通意义上的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作品,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小说,而是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进行百年沉思、因而充满着世纪悲凉的文化小说”。^[1]从第一回起,吴敬梓便在卷首词中点出了一种百年历史反思意识,所谓“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思,总把流光误”。^[2]“百代”在开篇的出现,已明显地揭示出吴敬梓在小说中所秉持的是一种浓郁深沉的历史反思意识。尽管自古及今,百年更迭,兴衰无度,但不管何时何代,世人对功名富贵的贪求之心却始终没有改变,往往一见功名就会舍命求之,全然不顾是非曲直与善恶美丑。小说于首回就向读者点明作者对世人追求功名富贵的历

史反思意味,这也为在其后的章回中描写并揭露成化末年(1487年)至嘉靖末年(1566年)近百年的各色儒林人物追逐功名富贵的丑态埋下了精妙的伏笔。小说结尾,吴敬梓又赋词一首,曰:“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普旧,写入残编总断肠!”^[3]最终作者怀着“残编总断肠”的极度悲愁之感,对已经被功名富贵熏染的儒林社会作出百年记叙,表现出浓郁的时间意识。而这“百代”与“百年”于首尾呼应中所凸显出的百年时间意识,使吴敬梓有力地、辛辣地讽刺了在科举仕途中“费尽心思”却“总把流光误”的历代儒林士子。此外,“《儒林外史》有5次说到‘自古及今’(第一回、第十回、第十一回、第三十回、第三十四回),显示出强烈的历史意识”。^[4]

从叙事的主要进程上看,小说的主体叙事时间应是明朝成化末年(1487年)至嘉靖末年(1566年),准确来说,一共是八十年的时间。在这段叙事时间内,作者以其严密的时间逻辑思维,巧妙推进作品的主体叙事时间的纵深发展,深刻地表现出一种世事时运兴衰交替、人物命运沉浮更变的人世历程。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已相对确立了脉络明晰的叙事时间框架,并在小说具体章回中都注明了具体叙事时间节点,从全书第一回的元末明初,到第二回的成化末年,然后到小说第八回的正德十四年,再到第三十五回的嘉靖三十五年,最后到第五十五回的万历二十三年,这种叙事时间的演绎推进显示了《儒林外史》以“史”名篇的特征,体现出中国小说传统的“慕史”倾向。正是在此脉络明晰的叙事时间结构下,《儒林外史》出色地塑造出从明成化末年(1487年)至嘉靖末年(1566年)这八十年间的数批儒林人物。第一批就是生活于成化末年的周进、范进,以及严贡生、严监生等人,他们这群人是封建八

收稿日期:2011-09-25

作者简介:桑甜甜(1987-),女,山东淄博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股取士制度的忠实捍卫者、追随者,精神极度虚空,充满了吝啬、贪婪和势利等酸腐气息;第二批是生活在正德末年至嘉靖前期的娄三、娄四公子,马纯上、匡超人、牛浦郎等,他们当中有的人对八股举业满腹牢骚,有的人借举业谋取饭碗,还有的人竟借举业和名士头衔进行坑蒙拐骗,这宣告儒林人物的道德品质已泯灭了;第三批是活动于嘉靖后期的杜慎卿、杜少卿,以及余特、余持兄弟等人,他们或则在梨园选美胜会中竟显名士风流,或则与虞博士、庄绍光祭祀古贤,追求与八股取士制度相对立的礼乐理想,但仍逃脱不了在势利的风俗中背井离乡的悲惨命运。第四批则是生活在嘉靖末年的陈木南,以及汤由、汤实等,这群人勉强算是儒林人物,他们已用妓院和教坊取代了虞博士们的先贤祠,向妓女谈论科场和名士风流了,确是一代不如一代。至此,不同时期儒林人物的不同风貌在这将近百年的时间得到形象传神地展现,但仔细看来,这数批儒林人物及其活动本就没有紧密的必然性联系,而吴敬梓却在叙述中有意识地把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活动时间都交代得一清二楚,随着叙事时间的推移,各类人物依次变换,环环相扣,连成长串,如此一来,伴随人物上场而呈现的互不相关的纷繁事件被有机地扭结在时间的链条上,不再是乱麻一团,散沙一盘,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最终一幅栩栩如生的儒林人物画卷有条不紊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二 《儒林外史》在叙事空间上的结构完结

揭露八股科举制度的弊端,批判功名利禄观念,是《儒林外史》的中心主旨。与功名富贵观念相对立的,是吴敬梓所标举的“文行出处”,作者借王冕之口就说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9]作者在表达这一主旨时,统篇的结构堪称绝妙,除了按时间推进叙事外,在空间结构方面也是别具匠心。叙事时间的大跨度移位,也为大幅度的叙事空间建构提供了便利。

一方面,从地域空间来看,叙事中出现两大地域空间的转移,即从帝都北京到旧都南京。纵观小说,大都会南京显然是叙事空间的核心。同时,以南京为叙事空间的核心,小说主要人物于两城之间流离和回归,不断更换改变,次要人物更是层出不穷,并与之丝缕相连,相关儒林人物的出场及命运安排亦由此“信手拈来”。楔子以后的头七回,无论是写山东汝上县的周进、广东南海县的范进、高要县的严贡生兄弟,或是南昌府和南赣道的王惠等人,由于这些人物是八股取士制度的狂热维护者,

他们把追求功名富贵的最终希望都理所当然地押在了北京上。然而,随着第八回娄三、娄四公子的出场,吴敬梓借其口嘲讽了把帝都由南京移到北京的明成祖,“帝都情结”主导下的功名利禄之心开始被消解或冲淡。娄三、娄四就认为:“宁王此番举动,也与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运气好,到而今称圣称神,宁王运气低,就落得个为贼为虏,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这种想法是不合大明官方主流舆论的,显示出一定叛逆性。到王惠在南赣依附宁王叛逆,更使得这种“帝都情结”象征性的毁灭了。再细细品味第三十五回的“圣天子求贤问道,庄征君辞爵还家”,就能明白吴敬梓选择南京和北京两地展开情节的良苦用心。对于庄绍光吴敬梓是持肯定态度的,庄绍光的行为和话语其实代表了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鉴于当时的官场形势,睿智的他选择“独善其身”。在北京,当庄绍光拒绝太保的“美意”,太保则向皇帝进谗言,诋毁庄绍光。对此,嘉靖皇帝也只不过“叹息了一番”,就此作罢,而庄绍光则毅然决然地返回南京。此外,吴敬梓于书中极写南京元武湖优美景色和南京城的壮观气势,并用叙事者正面的眼光去展示、描绘它,相反全书对北京景色几乎不写,这其中就暗含了作者对作为官场权力中心北京的否定,对作为竟显名士风流南京的肯定。“南京是作为一个斯文旧都,还有人讲究文行出处的旧都,与北京作为一个八股取士的帝都,群相竞逐功名富贵的帝都互相对峙而存在,从而构成小说叙事空间的南北互异的双焦点的。”^[10]总而言之,叙事空间的建构大体上由北京和南京两大象征性空间之间的对比构成,作为价值论的空间南京与现实矛盾的根源北京构成意图上的对立。

另一方面,从自然山水及历史名胜的空间构建来看,小说存在三处富有代表性的叙事空间节点,即莺脰湖、莫愁湖、泰伯祠,它们的出现同样显示了吴敬梓巧妙的空间建构艺术。作者紧紧围绕这三处叙事空间中发生的大宴名士、高会以及祭主这三件事情,不仅巧妙合理地将一批又一批儒林人物的出场安排穿插在其叙事当中,还将聚散离合于这三处叙事空间的诸多人物所经历的其他事情一同串联起来,共同构成整部作品的故事情节发展的主体。虽然贵公子娄三、娄四对“帝都情结”主导下的八股取士带有叛逆性思考,但二娄公子并没有找到精神归依。第十三回写到其主持的莺脰湖大会,简直就充满讽刺性的意味。看看聚会上的人,有所谓的侠客张铁臂,实则是会行坑蒙拐骗的贼盗;有古

风古貌的杨执中,但也有小人嘴脸、怪模怪样的权勿用;有潇洒翩翩的书生公子,但也有愚蠢至极、混吃混喝的陈和甫等人。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可谓鱼龙混杂,再加以胜会的美名,实在可见当时儒林人事的衰朽不堪,极具讽刺意义。到了第三十回写到“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又以杜慎卿为中心,塑造出了一大批新的名士,如季苇萧、郭铁笔、萧金铉等,他们是数批儒林士人中最有声色的一代,他们在胜会中尽情抒发名士风流,而南京俨然成了他们展现名士风雅精神的绝佳舞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物当中有些人最终还是找到了可依靠的精神故乡的。此后的第三十七回便是泰伯祠大祭了,这是全书的最大事件和高潮,是俯瞰全书的高峰,几乎所有儒林人物在其中均得以出场表现。有学者就认为抓住并领悟吴敬梓构建泰伯祠这个特殊的叙事空间节点“是掌握全书艺术构思的枢纽,也是在这里,把全书的主导思想——原始儒家的思想表现得最显豁”。^[7]从虞育德主祭泰伯祠到“诸贤”纷纷离去再到王玉辉前来“瞻拜”时,先前修建得齐整伟岸的泰伯祠已经积满灰尘,这暗示作者的“礼乐”理想幻灭。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杨义.《儒林外史》的时空操作与叙事谋略[J].江淮论坛,1995,01.
- [2]吴敬梓.儒林外史[M].张慧剑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
- [3]吴敬梓.儒林外史[M].张慧剑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576.
- [4]杜贵晨.数理批评与小说考论[M].齐鲁书社,2006:355.
- [5]吴敬梓.儒林外史[M].张慧剑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3.
- [6]聂俊亮.严密而有意义的时空组织[J].邢台学院学报,2006,03.
- [7]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8.
- [8]杨义.杨义文存中国叙事学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7:46.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吴敬梓这样的叙事时空构建是独具艺术特色的。同时《儒林外史》的叙事时间与叙事空间也并不是各自独立而无要紧要的,二者有机结合,共同结构,“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进而生成整部《儒林外史》独特的叙事结构,这正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从不孤立地观察和思考宇宙人间的基本问题,总是以各种方式贯通宇宙和人间对之进行整体性的把握。通行的思维方式不是单相的,而是双构的。”^[8]具体来说,在叙事时间安排上,前后历时共计108年,由于叙事上有这种严格的时序,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前后统一,彼此照应,有条不紊。而空间结构大体上由北京和南京两大象征性空间之间的对比构成,虽然北京很少成为实际上的空间背景,但从小说内容来讲,可以看出,作为价值论的空间南京与现实矛盾的根源北京构成创作意图上的对立。

总之,《儒林外史》独特的叙事结构,是对传统章回小说结构的重要突破,而这种突破当归功于运用了严密而有意义的叙事时空建构艺术。当然,在叙事时空的巧妙构建下,作品中时世人事的盛衰兴亡、悲喜沉浮也得到史诗式、全景式地展现,这恰契合着《儒林外史》的“慕史”倾向,令人惊叹。

Analysis of Artful Construction on Narrative Time and Space in The Scholars

SANG Tian-tian

(Literature Departments,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0)

Abstract: There are full of Confucian scholars who are true and false, poor and rich, implicit and explicit, elegant and vulgar, clever and humble in The Scholars. The novel portrays the picture of people's daily life, which contains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ystem in the na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ordinary citizens in the bottom of society. The numerous characters in the colorful and profound society show the artful construction practices on narrative time and space adopted by Wu Jingzi. Because of these practices, Wu Jingzi can make the characters vivid, and describe the complicated picture of life, which bring the great success on The Scholars.

Key words: The Scholars; Narrative Time; Narrative Space; Build

(责任编辑:张俊之)